

JiQun ChengZhang Yu Qu Yu FaZhan

集群成长与 区域发展

王 琪 / 主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集群成长与区域发展

王 琚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集群成长与区域发展/王珺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 - 5058 - 4219 - 6

I. 集… II. 王… III. 地区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F1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890 号

责任编辑: 纪晓津

责任校对: 杨晓莹

技术编辑: 董永亭

集群成长与区域发展

王 琚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2.75 印张 280000 字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58 - 4219 - 6/F · 3497 定价: 24.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扎根现实、放眼 全球的企业集群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区之间的增长与创新活力差异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金融、通讯、技术与市场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不仅没有消除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相反，基于相关产业内的大量企业在地理上的聚集形成的创新与地区增长却降低了全球化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企业聚集形成的专业产品区或集群也在迅速地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学术界、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对这种集群创新活动与区域增长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大量的文献表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而现阶段的创新活动主要是以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聚集为特征的，集群就是形成这种地区之间增长与创新活动差异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以 IT 产业为标志的美国“硅谷”集群和以相关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聚集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等案例已成为这种地区增长与创新活力的反映。

事实上，不仅企业集群早在 18 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而且一些学者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展了对这种现象的研究。马歇尔 (Marshall, 1910) 在 19 世纪后期就曾对此做过一些理论解释，例如，把产业的地区性聚集看成技术外溢、中间产品投入与劳动力市场共享等三个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重要性等。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

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也都对集群现象做过论述 (Weber, 1929; Losch, 1954; Grannovetter, 1985; Piore and Sabel, 1984)。这些文献主要围绕着什么是企业集群、它为什么会发生、形成后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集群的周期性变化等问题而展开。然而, 关于集群的研究从没有像近十几年来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 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波特 (Porter, 1998) 以地理上的集中与“钻石模型”的四个基本因素整合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体系以及阿歇姆等人提出的“地区创新体系”理论等 (Asheim and Isaksen, 1997)。显然, 这不仅是与集群作为一个有利于降低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的经营环境相关, 更重要的是, 在创新作为地区增长动力的今天, 集群竞争力是与创新活动紧密相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集群被看成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增长障碍, 参与市场竞争, 推动创新活动, 从而形成地区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OECD, 2001)。

我们对集群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理论兴趣, 而是基于对广东各市县的调查引发的理论思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调查研究中, 我们发现了广东,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乡镇存在着大量的“一镇一品”的产业聚集现象。越是相对较发达的地区, 这种现象就越明显。于是, 我们与广东省的一些学者共同提出了“专业镇”的概念, 如中山市古镇灯饰专业镇、小榄五金专业镇、大涌红木家具专业镇、南海西樵纺织品专业镇、金沙五金专业镇、南庄陶瓷专业镇、盐步内衣专业镇、大沥铝型材料专业镇、平洲制鞋专业镇、东莞石龙电子专业镇、清溪电子配件产品专业镇、顺德乐从家具销售专业镇、龙江家具生产专业镇、伦教木工机械专业镇、江门蓬江摩托车专业镇以及潮州泰兴陶瓷制品专业镇等。虽然“专业镇”并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学术概念, 它以乡镇的行政边界为基本特征, 而各乡镇也不完全都只生产某

一种产品，但我们认为，在集群发展初期，这是有积极的政策意义的。因为，一方面，以乡镇为单位，可以找到一个十分明确的制度与政策扶持的行为主体；另一方面，广东各市县下属的专业镇大部分是以纺织、制鞋、家具、小五金、服装、内衣以及电子配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这些产品的质量升级需要公共服务平台的扶持。在缺乏民间的中间组织参与公共平台与制度建设中，如果再缺少一个制定与实施政策的行为主体，那么，这对于推进这些专业镇的质量提升是不利的。这个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广东省科技厅所接受，并构建了一套评价专业镇的指标体系，凡是符合这个指标体系的专业镇，不仅可以得到广东省科技厅创新专项基金的扶持，而且被授予广东省科技厅专业镇的品牌。我不仅参与了这种指标体系的选定，也参与了对各个专业镇的评估过程，我们发现，这种以乡镇、县市政府以及广东省职能部门在优惠政策与实施过程中的积极互动成为广东省专业镇产品质量提高与创新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我们对专业镇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提出各种政策性建议的层面。不同省份之间的经验比较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集群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提炼出更为普遍性的一些理论特征，这不仅对视野扩展，也对把握集群发展的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内视角看，以相关传统产业中的中小企业聚集为特征的“江浙模式”和“温州模式”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许多学者（王缉慈，1998；仇保兴，2001）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国际范围看，“第三意大利”的成功以及欧洲许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构建“地区创新体系”的政策实践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理论。于是，在与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机构合作交流与展开合作研究基础上（诸如浙江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技处、法国国家计划发展研究中心、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经济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经济系），我们开始更加关注集群成长与区域

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诸如集群成长与创新机制、集群创新与地方政府以及中间组织的作用、集群演进阶段与周期分析、集群成长中的企业家角色、集群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产业链条分工网络构建、集群中企业合作与信任、相互依赖等社会资本解释、集群内组织合作与竞争机制分析以及集群与外部经济活动的网络联系等。目前，本论文集收集到的论文大致反映了我们这个研究队伍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思考与分析。

在这部论文集中，大部分是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的论文。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已经发表过的相关论文收集起来编辑成册，而不出版一批有理论体系的学术专著？我们认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关注这种集群现象，近几年来，我们也在这个研究领域申请到了各种层次的资金资助，如国家社科基金资助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6项、教育部资助4项、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以及科技厅、教育厅等资助项目9项等，同时，也与国外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诸如费拉拉大学经济系、佛罗伦萨大学经济系等建立了合作研究制度，并在这个领域也发表了相关的一系列论文，但是，由于我们缺乏一个可以系统地反映这种观点与数据的学术期刊，所以，把这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收集起来编辑成册，有利于让同行学者系统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进行交流。另外，这些研究还是初步的，虽然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一些新视角、新观点以及新数据，但是这些文章还不足以形成一本有系统的论著。同时，我们也不愿意重复论述已讨论过的一些成熟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继续在这种学术积累基础上深化这个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加速推进这个研究，不仅要靠自我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中获得更多的“外部溢出”的收益，体现“学术集群”的有效性。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愿意把这些观点与分析，汇集起来，编辑成

册，奉献给大家。

本书共收集了 25 篇论文，共分为四个主题：集群类型与演进；集群制度支持与创新；集群成长的地区与案例研究；集群战略与国际化。

第一部分通过文献的归纳和评论，对企业集群的类型、发展阶段性以及演进的机制进行了理论考察，并建立了一个关于集群和网络的分类与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王珺教授提出，企业集群与网络的演进路径、阶段与持续进程是由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资本存量程度两个因素决定的；认为企业根据环境的不同，可能会选择三个不同的路径完成集群向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李新春、符正平、王珺等教授还从资源、企业家和市场等不同角度对集群成长的条件和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李新春教授提出了“企业集群组织是企业家协调”的观点。

第二部分着重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探讨集群成长和集群式创新中所必要的制度支持、组织支撑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提出集群的成长和创新，除了自身的力量之外，还需要政府和民间中间组织的努力以及制度化的网络体系的作用。其中，丘海雄教授等从财政分权的制度激励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的地方政府是集群技术创新的最主要行动者，其积极性和作用远甚于西方的地方政府”的重要观点，并提出适合研究中国集群技术创新研究的“动态主体模型”。

第三部分结合珠江三角洲产业集群成长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的集群成长与地区差异的联系以及生成因素。在这一组文章中，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与传统产业聚集的差异性是考察的重点。比如，李新春教授在分析以 IT 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式成长与地区优势形成之间互动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影响高科技创新创业的关键要素在于企业家、组织和市场机会”的观点。毛艳华副教授也考察了珠江三角洲 IT 制造业集聚机制及竞争优

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丘海雄、崔强和王珺的论文集中分析了传统产业聚集的特点与演变过程。赵祥的论文也考察了传统产业集群中非正式规则的作用等。

第四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是集群成长的战略与国际化的问题。在这一主题中，李新春教授从市场转型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战略的网络化问题；符正平教授则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探讨了集群成长的过程，构建了一个集群成长的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创新驱动、市场驱动和学习驱动的三种集群成长的模式。李新春、王珺教授都分析了“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的差距。两位教授对“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不同视角的分析。李新春教授认为，“差距”的形成原因是集群化的制度基础不同，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使其跳出已有的“路径锁定”。而王珺教授则认为“差距”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创新能力，并通过分析集群组织内所特有的学习力与创新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产业集群是目前我国有效加速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机制，是实现“中国制造”从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逐步走向高端的有效途径。

这本论文集记录了近几年来我们对企业集群问题的现实调查、理论思考和研究历程，它的出版只看作是对我们在有关企业集群的研究领域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当然，国内产业集群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集群的发展，现实中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还很多。比如，集群中外部性的边界研究，集群的开放性与根植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关系，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集群创新范式与发展中国家缺乏网络联系的集群之间的比较研究，集群中的学习机制与网络构建的联系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在大量调查基础上，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基金、教育部社政司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广东省科技厅、教育厅以及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提供的项目资助与支持。

是这些组织的项目资助推动了我们有系统地开展了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随后，我们还要出版以广东集群为主要内容的案例集以及有体系的理论专著，从而形成集群研究的理论特色。

王 瑰

写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2004 年 10 月 25 日



前言：扎根现实、放眼全球的企业集群研究 王 琪 (1)

一、集群类型与演进 (1)

社会资本与生产方式对集群演进的影响

——一个关于企业集群的分类与演进框架的

讨论与应用 王 琪 (1)

论簇群经济的阶段性演进 王 琪 (27)

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

——对珠江三角洲专业镇企业集群化成长的

分析 李新春 (38)

论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与形成机制 符正平 (62)

专业产品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视角

..... 丘海雄 徐建牛 吴凌芳 (76)

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

——广东专业镇经济的理论分析 王 琪 (82)

产业集群与企业成长 王 琪 王 峰 (95)

二、集群制度支持与创新 (115)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丘海雄 徐建牛 (115)

企业簇群的创新过程研究	王 琪	(142)
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	李新春	(162)
企业集群兴起中的家族主义	李新春	张书军 (176)
企业集群中的地方政府作用与中介组织发育	姚海琳	王 琪 (188)
企业集群成长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姚海琳	王 琪 (206)
社会资本结构与民营企业成长	王 琪 姚海琳 赵 祥	(223)
三、集群成长的地区与案例研究 (239)		
高科创业的地区差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与政策优惠	李新春 宋 宇 蒋年云	(239)
论专业镇经济的发展	王 琪	(265)
剖析集群创新 ——西樵纺织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	丘海雄 崔 强	(274)
珠江三角洲 IT 制造业集聚机制及竞争 优势研究	毛艳华	(290)
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与网络	王 琪	(302)
非正式融资安排与企业集群发展	赵 祥	(311)
四、集群战略与国际化 (327)		
企业战略网络的生成发展与市场转型	李新春	(327)
企业集群效应与集群战略研究	毛艳华	(344)
现代管理与企业集群成长	符正平	(357)
集群化“中国制造”的制度特征与竞 争力	李新春 戴吉林	(371)
集群制造与创新：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 中的作用	王 琪	(386)

一、集群类型与演进

社会资本与生产方式对 集群演进的影响

——一个关于企业集群的分类与
演进框架的讨论与应用

王 琪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对经济区域化的关注也相应地增加了。大量的学者用地区聚集与产业聚集相结合的企业集群、网络与产业区等来解释各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差别证明了这一点（Ohmae, 1995; Coyle, 1997, 2001; Krugman, 1991, 1997; Storper, 1997; Porter, 1998, 2001; Scott, 1998, 2001; Fujita et al., 2000）。企业集群早在 18 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马歇尔（Marshall, 1910）在 19 世纪后期就曾对此做过一些理论解释，

王琪博士，中山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教授。

例如，把产业的地区性聚集看成是技术外溢、中间产品投入与劳动力市场共享等三个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重要性等。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也都对集群现象做过论述（Weber, 1929；Losch, 1954；Grannovatter, 1985；Piore and Sabel, 1984）。这些文献主要围绕着什么是企业集群、它为什么会发生、形成后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集群的周期性变化等问题而展开的。尽管在概念与分类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自波特（Porter, 1990）把企业聚集与地区竞争力建立了直接联系后，学者们对企业集群的看法基本上集中到波特（Porter, 1998）提出的概念与思路上来（P. Brown and B. Menaughton, 2002）。然而，波特是从竞争力角度解释集群的存在、优势与作用的，而不是从企业集群角度讨论集群分类与演进进程的，因而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讨论集群分类或演进的文献很多（Markusen, 1996；Storper, 1997；UNTAD, 1998；Brusco, 1990；Sforzi, 1998；Tichy, 2001；Di jk, M. P. van, 2001；王缉慈, 2001），但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集群分类与演进之间分离，例如，以一些纬度划分的类型基本上停留在静态的归纳，而解释动态演进过程的类型又缺乏纬度指标的支撑。本文试图从两者结合的角度讨论集群与网络的分类与演进的理论框架。首先确定两个划分集群与网络环境的纬度，分析它们之间的组合类型与特征，然后讨论这些集群与网络环境的演进路径与因素，从而构划出集群与网络演进的路径安排与类型，最后用这个理论框架考察广东专业镇的阶段定位与发展趋势。

二、集群、网络与产业区概念及决定因素

生产与购买是企业战略决策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这项决策取

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科斯（Coase, 1937）用交易成本概念解释了外部环境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当企业内生产增加的各项费用高于外部购买增加的交易费用时，一部分业务会外部化。如果前者低于后者，一部分业务就内部化。理查德森（Richardson）认为，这种“企业与市场，指导性协调和自发协调间的区别……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制度事实，舍弃了这可以提供独特的合作方式”。^① 虽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但他没有进一步考察企业在什么环境下做出纵向一体化的决策，或什么样的环境下促使企业制定分包网络战略。现有的企业战略经济学家（D. Besanko, D. Dranove and Shanley, 1999）基本上从企业应对变动的环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讨论战略决策，而不是从环境的变化类型角度加以讨论，因而难以找到合适的解释。本文从集群、网络与产业区等作为单个企业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角度，研究它们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以及对企业制定适应性战略产生的影响。

企业面临的环境与企业一样也具有异质性。集群、网络与产业区等就是企业面临的不同环境。所谓企业集群（Clusters）是指同一类产业内的企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Schmitz, 1996），而这种聚集包括了企业之间存在的分工协作联系与缺少这种联系的两种情况，换句话说，集群是从相关产业在地理上的聚集角度进行界定的。本文将这两种情况都作为集群范围。企业网络（Networks）指的是企业之间相互配套的分工协作联系（P. Brown and R. Menaughton, 2002），这种划分是从企业是否发生分工协作联系作为判断的。那么，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既可能在某一个地区内发生，也可能在跨地区间出现，而跨地区的分工协作关系

^① G. B. 理查德森（Richardson）：《产业组织》，载 L. 普特曼等编，孙经纬译：《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5 页。

是无法纳入到集群的范围的。本文把这两种分工协作联系也都算作企业网络。而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概念是对企业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地理聚集现象的一种概括。因此，集群、网络与产业区之间是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的。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容易出现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与模糊（B. Martin and P. Sunley, 2003）。

企业环境类型的划分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生产方式差异；二是社会资本水平。生产方式差异指的是大规模、标准化的福特式生产方式与小批量、定制式的柔性专业化生产体系之间的区别。这是皮奥尔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 1984）等人在研究意大利北部产业区过程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标准化的生产工艺与中间产品使不同产品的零部件可以互换，这种有利于大幅度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的福特管理范式是大企业组织的独特优势；而柔性专业化生产体系适合于以非标准化产品和工艺程序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如信息技术、电信、个人用品、啤酒饮料、早餐食品、快餐以及保险、银行等。由于中小企业从事的是小批量、定制式、非标准化产品制造与服务，因此，大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领域的协调与管理成本就比较高，中小企业受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威胁就比较少（Amin and Robins, 1990；Storper, 1990）。卡配奇（V. Capecchi, 1990）进一步区分了福特生产方式与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的差异，他指出：“福特制是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而柔性专业化生产体系是小批量生产、定制式机器和产品。福特生产体制是泰勒式层级管理体制，蓝领与白领是分开的，白领从事监督蓝领人员的工作；而柔性专业化是三个层次的人员，即白领管理者、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相互合作的管理模式。福特生产方式就像产品一样是一种标准化生产程序；而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要求工厂与委托人之间紧密合作，从而才能生产出消费者导向的产品。福特生产方式的配置空间是在大工

厂；而柔性专业化生产体系则是在产业区范围内小工厂等”。^①欧洲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产业的集群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产业领域所具有的灵活专业化、小批量与定制式生产方式是大企业不具有优势的。派恩（B. J. Pine, 1999）认为，随着市场结构的细分以及需求的快速变化，一些以小批量、定制式、非标准化产品生产制造与服务的传统产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当一部分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密集产业也开始转向定制式、小批量的生产方式。这使得定制式生产方式与福特式生产方式相比还会进一步扩展。

另一个因素是集群环境中的社会资本水平。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因而社会关系与结构对个人行为产生重要的作用，基于过去相互了解的经验基础可以形成一定的相互信任与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在格兰诺维特研究的基础上，科尔曼（Coleman, 1990）把蕴含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概括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这种资源有利于形成协调与合作的行动来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鼓励专业化，增加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观念创新上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效率。自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后，许多学者（Coleman, 1990; Putnam, 1993; Bourdieu, 1992）用这个概念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集群的影响在研究集群的文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普特南（Putnam, 1993）通过对意大利南方与北方长达 20 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意大利北方在经济与地方政府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南方，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相互信任水平的差

^① V. Capecchi: "A Hist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Emilia-Romagna" ed by Pyke, Becattini, and Sengenberger,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ILO, Geneva, 1992. P. 21.